


清朝十二帝

陈书媛 编著 第二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二卷
陈书媛
编著



清朝十二帝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七章 边疆得巩固

一

中国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到皇太极时期，西起贝加尔湖，北到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东抵鄂霍茨克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东北广大地区，都在清统治的势力范围之内，属于中国的版图。沙皇俄国是个欧洲国家，原来和中国的疆界相距万里。直到崇德元年，俄国人才第一次听说东方有条黑龙江。此后，沙俄政府就不断派遣远征军，对黑龙江地区进行肆意掠夺。

康熙四年，沙俄入侵军窜犯占领了雅克萨（今黑龙江省漠河东、塔河西北的黑龙江北岸），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建立据点，构筑寨堡，设置工事，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抢掠中国的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族民众的财产和人口。沙俄政府为配合武装入侵活动，不断地派遣外交使节到中国来，以访问为名，收集情报，探听消息，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和讹诈。康熙九年，沙俄政府派了一个叫米洛瓦洛夫的人来中国，要求康熙帝向老沙皇称臣纳贡，说这样才能得到俄皇陛下的恩惠和保护。十五年，沙俄政府又派了个名叫尼果赖的人，率了一个使团来中国，大肆吹嘘沙俄如何如何强大。说沙皇是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月亮和所有的星星。因此，任何国家的君主都要受沙皇的庇护，好像星星受太阳照耀一样。

康熙帝并没有被沙俄使团的这些威胁吓倒。但沙俄了解到了康熙正在全力以赴平定三藩之乱，中国出现了动荡的局势。尼果赖立即向沙皇报告，狂妄地说，只要有两千名正规军，就能使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上的人们，都可能臣服于沙皇俄国。此后，沙俄军加紧了在黑龙江地区的侵

略活动。调拨了大批枪炮、物资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不断派遣入侵军人员分路四出，向中国内地蚕食扩张。从十五年到二十一年，沙俄军推进到黑龙江的各条支流上，建立了据点，康熙虽然不断派遣使臣进行交涉、劝说、警告都无用，他们的侵略活动更变本加厉。

二十二年十月，康熙下令设黑龙江将军，由萨布素首任此职，命其率宁古塔兵一千人进驻额苏里（今黑龙江省黑河与呼玛之间的黑龙江北岸）。黑龙江将军的设置，使抗击沙俄入侵军有了组织保证，对加强东北的边防建设有深远意义。它和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为吉林将军），奠定了后来东三省建置的基础。

康熙命萨布素等到黑龙江的首要任务，是筑爱辉城（今黑河市）。爱辉（旧名瑗瑄），明朝的时候称胡里平寨。清顺治九年，被沙俄入侵军焚劫，成了一片废墟。康熙十三年，清军在这里建了一个木城，但规模太小，现在按康熙永戍的要求，必须重建。二十三年，爱辉城建成了方形城堡，周长九百四十步，合四千七百尺，设有五个门。后来因为这城堡地处江东，与内地交通联系很不方便，就在原来名叫托尔加城的旧址，另建了爱辉新城。新城比旧城大，方一千三百步，高一丈八尺，也设有五个门。从此，清军就在爱辉城驻兵屯粮，成了抗击沙俄入侵军的重要基地。

康熙为了将大批军需物资运往黑龙江，广泛听取了大臣的意见，组成了一条横贯东北三省的水陆运输线。从南到北，全线长四五千公里，沿途设兵驻防，建造粮仓。康熙还命令前线部队就地屯田，专门派了侍郎萨海等前往监督耕种，从而保证了黑龙江驻戍部队的供给。

康熙为了使前线奏报军机畅通、及时，命令理藩院侍郎明爱，率兵勘测了一条从黑龙江至北京最快传递军情的路线。这条路线从爱辉西南，翻越小兴安岭至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由墨尔根通过齐齐哈尔直达松花江北岸的茂兴，接上吉林到北京的驿站。紧急军情可从茂兴转西南，由内蒙古驿站飞马驰入喜峰口送往北京。康熙还具体规定了每个驿站设壮丁三十人，马二十匹、牛三十头。壮丁从盛京、宁古塔所属各驿站派出，马和牛由盛京户部按数采买送去。康熙永戍黑龙江的措施，有效地扼制了占据雅克萨的沙俄军向黑龙江中下游继续扩张的企图。在康熙的亲自组织指挥下，到二十三年，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及各条支流上的沙俄军据点，已基

本被肃清，为收复雅克萨等地创造了条件。

康熙通过永戍黑龙江的措施，到二十四年初，收复雅克萨的作战准备已基本就绪。他收复雅克萨，对沙俄入侵军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一再声明：“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一年前，康熙曾用满、蒙、俄三种文字写信致俄国察罕汗，并派官员送给占领雅克萨的沙俄军，要他们立即送还根特木儿，从中国撤兵。

沙俄政府对康熙的信置若罔闻。这次，康熙在出兵前，再次致信沙俄政府，并叫两名俄俘送回国，表示如他们立即从雅克萨撤回，我兵即只驻扎在黑龙城，雅克萨只设瞭望哨。如拒绝撤兵，我大兵即要相机进取。

沙俄政府对康熙的信仍毫无反应。在这情况下，康熙于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班达尔善统兵三千，及水师将领林兴珠率藤牌兵五百，分批开赴雅克萨，五月中旬陆续到达。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了雅克萨。沙俄军首领托尔布津，自恃城坚炮利，在城头与清军将领对话时，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这时，有一队四十余人的沙俄军乘木筏前来增援，被清军当即全部歼灭。当天晚上，清军按康熙的指令，以声东击西的战法部署兵力。先在雅克萨城南筑起土垠，布置了弓弩，佯作攻城的架势，暗地在城的東西两侧，架起了红衣大炮。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开始攻城，大炮突然向城里齐发轰击。因为城内沙俄军无防火设备，城池又是木质结构，所以被炮火击中的地方，即烈火熊熊，硝烟弥漫，顷刻间，城内到处起火。沙俄军陷入一片混乱，一百余人毙命。

清军又在城周围堆起了预先准备好的干柴，准备点火焚城，见城内沙俄军慌成一团，就用弓箭将劝降信射入城内。劝降信是按照康熙“仁至义尽”的原则拟定的，条件很宽大。即只要他们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产。沙俄军首领托尔布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竖起了投降的旗子。

清军见沙俄军投降了，就立即停止了攻击。统帅彭春在沙俄军举行投降仪式后，宣布俄俘全部释放，派遣官兵将其七百余人（包括少数妇女、儿童），送至额尔古纳河口，返回尼布楚。另有四十五名俄俘不愿回国，康熙命令将他们留下，安插在盛京。至此，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获胜，沙俄军投降而告终。

沙俄入侵军另一首领维雅索夫，以雅克萨之败为俄国人的耻辱，在托尔市津等回到尼布楚没有几天，即派兵七十人到雅克萨侦察清军动静。他们见到雅克萨四野萧条，杳无人迹，就立即返回报告。回到尼布楚不到两个月的托尔布津，奉命又率兵侵占了雅克萨。这次，沙俄军因为又得到了波兰被俘军官皮尔顿率领的六百名哥萨克兵的支援，兵力增加到八百多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康熙得知沙俄军重占雅克萨的消息后，随即部署了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他谕示文武大臣：“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进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今后图之不易。”旋命将军萨布素、郎坦等，速修船舰，统领乌拉、宁古塔兵两千人，攻取雅克萨，又命令调福建藤牌兵参战。七月，清军抵达雅克萨。萨布素先释放一名俄俘捎信入城，谴责沙俄军偷偷返回，重建城堡，警告他们将要受到驱逐的下场。沙俄军自恃这次兵力强，火器多，有充足的弹药和粮食及坚固的工事，因此对清军的警告，毫不放在眼内。他们不断地派出小股士卒出击，使清军的火炮及攻城器械，不得靠近城垣。

清军的火器比较弱，除了一些大炮外，只有五十支土枪，士兵都是用刀矛弓箭作战，杀伤力小。但官兵士气高，每次能将出城突击的沙俄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并不断向城内发炮。在开战后的几天中，沙俄军就被打死了一百多人，连首领托尔布津也被炮火击中而毙命，后来由皮尔顿代为指挥。

清军由于缺少火器，沙俄军重修的雅克萨城又比较坚固，所以久攻不下。康熙考虑到已快进入深秋季节，命令前线统帅萨布素要做好部队过冬的准备，进行长期围困。要萨布素组织官兵，在雅克萨城周三面掘壕沟、筑堡垒，在壕沟外设置水桩和鹿角（带杈的树枝），分段防御；在城西面的江上，另设一支部队，以防江路来援的敌兵。康熙还担心盛京去的官兵不会喂马，还专门下命令调索伦的总管，及抽调部分黑龙江官兵承担这一任务。

清军按康熙的部署，将雅克城围得严严实实，使沙俄军人员进出不能

得，断绝了外援。沙俄军为避免被清军炮火袭击，都居住在洞穴里边，由于潮湿，病号很多。康熙知道后，要萨布素从爱辉派了医生去，如沙俄军需要的话，就给他们治疗。但沙俄军指挥官皮尔顿不接受，并且送了些小麦给清军，以表示他们军中有粮食吃，要坚守阵地。时隔不久，沙俄军人员连病带饿，活着的只剩下六十六人。

沙俄政府对康熙的多次善意忠告，一直是漠然置之的，当得知他们的军队在雅克萨又遭惨败，也无法救援时，被迫遣使团同清政府和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沙俄使团先遣人员到达北京，向康熙呈交了沙皇的信件。信中表示愿意和清政府和谈，请求清军撤围雅克萨，等他们以戈洛文为首的使团一到，和谈就开始。康熙见沙皇有和谈诚意，第二天就命令萨布素将部队撤离雅克萨三里以外。要求对沙俄军人员以礼相待，允许他们自由出入，给他们送木柴和粮食。当年冬天，清军按康熙的命令，单方面撤离雅克萨返回爱辉。至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又以清军获全胜而结束。

二十八年四月五日，经中俄双方使团协商，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康熙将使团成员作了充实，首席代表增加到七人，添进了熟悉东北边界情况的郎坦、萨布素等，仍以外国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和张诚（法国人）任翻译。四月二十六日，使团启程时，康熙根据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的形势，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决定对沙俄作出重大让步，他向使团宣布了新的谈判方针：“今以尼布楚为界，则俄罗斯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你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如对方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

康熙命派遣官兵约三千人随使团分两路行进，一路由索额图、佟国纲率领，自北京出发；一路由郎坦、萨布素率领，自爱辉溯黑龙江而上。两路分别于六月初五和十五日到达尼布楚。这时，沙俄使团首席代表戈洛文仍停留在贝加尔湖。他一方面继续配合噶尔丹劫掠喀尔喀蒙古，妄图强迫蒙古各部归顺俄国；一方面命令督军伊凡，率兵在尼布楚及其附近构筑工事。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已十九天了，戈洛文还没有到。但却多次派人到中国使团处，进行无理的指责和刁难。说中国使团带来那么多兵，其目的在于打仗，而不是谈判，要求中国使团撤离尼布楚，退到额尔古纳河口去。这些指责和刁难，被中国使团一一顶了回去。

七月初四，戈洛文终于到了尼布楚。八日，谈判在尼布楚城外二百俄丈处搭设的帐篷里开始。俄方代表进入会场先声夺人，仪仗森严，鼓乐齐鸣，三名使臣衣着华丽，神态高傲，卫队人员违反协议，暗藏手雷。中方代表进场时，没有仪仗、乐队，七位使臣并坐在一起，显得朴素、坦然。按协议规定，双方进入谈判现场的官兵各三百人，只能携带刀箭，不得带火器。另外，为了使中方兵力和俄方在尼布楚城内兵力平衡，中国木船可以载五百名兵士，载护卫部队两千九百人，停泊在离谈判会场二百俄丈处。

谈判开始，就以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的归属问题，及造成武装冲突的责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方代表索额图，回顾历史，以确凿的事实驳得戈洛文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复会时，戈洛文觉得要坚持以黑龙江划界，中国代表绝不会同意。他就故作姿态，假装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今黑龙江省逊克东江对面）为界。这方案，实际上还是将黑龙江中游以上的北岸地区划给沙俄。中国使团索额图等，缺乏谈判经验，没有按照康熙交待的原则，作好逐步退让的方案。当俄方提出了新方案时，认为他们让步了，自己也该让了，就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方案，一下把康熙指示的最后分界线摊了出来。俄方戈洛文听到中国愿意让出尼布楚，见目的已达到，心里暗暗高兴。但是戈洛文表面上还装得拒不接受中国的划界方案，继续与中国使团纠缠。

中国使团没有看出戈洛文的真相，认为自己提出的方案遭到对方拒绝，谈判继续不下去，就按康熙“俄罗斯不遵谕而行，尔等即还”的指示，准备返回北京了，戈洛文又变了一副面孔，他买通了中国使团的两名外国翻译，进行会外活动，劝说中国使团不要走，同时又继续与中国使团讨价还价。中国使团为使谈判成功，又作了退让，同意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分界线，让至尼布楚以东四五百公里的格尔必齐河，南岸的分界线让到康熙规定的额尔古纳河。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达成了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共六项条款，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按条约规定，沙俄政府得到了尼布楚周围及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清政府虽然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沙

俄霸占的领土，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俄东段的边界，结束了战争，使东北边境得以安定。这样就可集中精力，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因此，康熙对这次谈判的结果，深感满意。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康熙又下令进一步建立与健全管理机构，充实防卫力量，加强边境管理。在盛京、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境内）、黑龙江，分别设将军统兵驻防。由黑龙江水师营负责管辖爱辉、墨尔根、齐齐哈尔等三城的一百二十艘战船和舢板船，执行巡逻和战斗任务。康熙还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下令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等地建立了两国边界的界碑。将《尼布楚条约》的条款，用满、汉、蒙、俄、拉丁等五种文字镌刻在碑上作为标记，并规定要定期派人巡视界碑的情况，确立了巡边制度。此后，中俄两国边界，有较长时间维持了和睦与稳定的局面。

三

康熙九年，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这时在西藏当喇嘛的噶尔丹，立即从西藏赶回，声称奉达赖喇嘛的命令，为同母之兄僧格报仇。他将僧格的敌手车臣“台吉”（蒙古贵族的称号）驱逐出去，杀掉了僧格的儿子，囚禁了自己的叔父，攻杀了自己的岳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血腥手段控制了准噶尔部。

十六年，噶尔丹出兵攻掠已移居青海的和硕特部，杀掉了这个部的首领、自己的岳祖父，自称为博硕克图汗，并威胁厄鲁特其他部都奉他的号令。十九年，新疆“回部”（清代对天山南路的通称）伊斯兰教内部黑山派和白山派之间闹矛盾。噶尔丹率十二万大军，乘机攻占了回部叶儿羌、喀什噶尔等四个主要城市，新疆的整个天山南路被他控制。进而又攻占了新疆的哈密和吐鲁番，并不断袭扰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使清朝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噶尔丹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增强，野心也不断膨胀，在沙俄侵略势力的支持下，转而向东攻掠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尔丹率兵三万，攻占了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唆使扎萨克图汗进攻左翼王谢图汗部。土谢图汗出兵击毙了扎萨克图汗沙喇，及噶尔丹的弟弟多尔济

扎卜。噶尔丹以此为借口，于二十七年六月，大举进攻喀尔喀。这时喀尔喀部土谢图汗，正率兵在楚库柏兴（今色楞斯克）和沙俄军作战，后方空虚，遭噶尔丹袭击，顿时大乱。土谢图汗立即回兵反击噶尔丹，遭到失败，就与胞弟哲布尊丹巴活佛会合，率领属下台吉、子弟等内迁，请求清廷保护。康熙立即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迎接，于漠南蒙古乌珠穆沁等处，妥善安置了游牧地方。

噶尔丹在乌尔会河之战后，气焰更加嚣张，乘势进一步向内地深入。清军阻挡不住，使其一下进到西乌珠穆沁境内，距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东北）仅九百里。京师（今北京）官吏出现危机之感，全城人心惶惶，有些官府衙门竟闭上了大门，市场物价飞涨。康熙镇定如常，命令八旗禁旅将北京城实行了戒严；谕示朝廷文武官员，决定利用噶尔丹骄傲轻进的心理，部署兵力出击、围歼。

康熙于七月十四日，率禁军从北京启程，二十四日进驻博洛和屯（又名黄姑屯，今河北隆化），统筹全局，近地指挥。

康熙在启程前，就已患感冒。二十二日在途中，病情加重，整夜发烧，不得成眠。二十四日，到了博洛和屯后，他实在难以坚持了，在诸大臣的恳求下，决定暂且回京，命令前线各路兵马，听大将军调用，实际上前线作战的每个具体部署，仍由他决定。

康熙在大军出发前，担心噶尔丹得知官兵出击，会畏惧而退逃，指示福全要不断派人到噶尔丹军营劝说其退兵，以稳定噶尔丹。岂知噶尔丹早已探听到清军出击的消息，他根本不在乎。声称：“喀尔喀是我的仇敌，我因追击他们才闯入‘汛界’的，朝廷不将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交给我，是不会罢休的。”并说：“据我得到的消息，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亦在官兵。我今虽面临十万大军的对阵，亦无所畏惧。”因此，噶尔丹继续引兵南进。

清军两路大军出发后，各自按康熙预定的路线疾进。左路军由于副将允禔听信了他人的谗言，和主将福全的关系不协，并且私自向康熙陈奏告状。康熙担心允禔在军中闹坏了事，就立即下令将其调回了京师，另调了康亲王杰书率兵自察哈尔以东会福全军。所以，清军左路军北上耽误了几天时间，造成了右路军常宁孤军深入。常宁军在乌珠穆沁和克什克腾旗交界的地方与噶尔丹相遇。噶尔丹军兵锋正锐，常宁军接战不

利，向南退却。噶尔丹长驱直入，至七月二十七日，急追至克什克腾旗南境，沿萨里河至乌兰滚，抢先占据了主峰乌兰布通峰，距同日到达吐力埂河的福全军仅三十里。康熙得报，命常宁停止后撤，速与福全军会合，夹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命杰书等率兵速西进，屯归化城，以切断噶尔丹西退的道路。

清军统帅福全等早已探听到了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设置的驼阵，但如何破之，心里没有底。经过两三天时间准备后，于八月初一的凌晨，各路兵马向乌兰布通进发，中午便与噶尔丹军交上了火。清军一开始进攻就不利。因噶军有骆驼作掩体隐蔽，清军用火统、弓箭仰攻，毫无效用，而自己因没有掩体蔽身，所以净挨打。左路军参赞佟国纲、佟国维见情况紧急，立即率兵从左侧渡过萨里克河，向噶尔丹军冲击，佟国纲中鸟枪阵亡，前锋参将格斯泰及前锋统领迈图亦先后战死，众多的兵士遭到伤亡。

康熙闻报前线作战因破不了“驼阵”而失利，即命炮兵将领费扬古，率京师八旗炮兵营，携带在平三藩之乱期间仿造的数百门红衣大炮，及新造的“连珠铳”、“冲天炮”等火器，疾驰前往参战。正当清军进攻受挫而束手无策时，康熙所派的炮兵赶到了，立即投入了战斗。大将军福全命令将各炮列于英金河滩上，齐发猛轰，声震天地。自午一直到傍晚，将噶尔丹设置“驼阵”的骆驼大部击毙。骆驼滚翻仆地，“城栅”断裂。清军乘势冲击，噶尔丹失去掩体，惊溃败退，噶尔丹自己乘夜避入山顶险要处。第二天，噶尔丹一面组织部队北撤，一面派喇嘛济隆率七十多人，到清军营地游说。并捎去请罪书，对佛发誓，保证不敢再犯喀尔喀。福全轻信了噶尔丹的诺言，中了缓兵计，于是命令各路军队停止了进攻。

康熙接到胜利捷报后，担心前线将领滋长麻痹轻敌情绪，下令要穷追不舍，不留后患。福全接到康熙命令时间已经过去五六天了，噶尔丹率残部已退去很远，追击已来不及。康熙非常痛心，马上派都统希福，驰赴福全军前参赞军务。但已无济于事，使乌兰布通大捷的战果功亏一篑。

噶尔丹从乌兰布通率残部两千人回到科布多（位今蒙古西部），他的营地早被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抢劫一空，连妻子（原为策妄阿拉布坦的未婚妻）等家眷也都被掳走。噶尔丹不死心，一面集合旧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一面乞求沙皇俄国支持。三十年，沙俄将军托布尔斯克派人去

科布多会见噶尔丹，继续策动其叛乱。三十三年，康熙多次约噶尔丹参加喀尔喀会盟，以调解其与土谢图汗等之间的矛盾。噶尔丹拒不接受，反而横蛮地写信给清政府，一定要索取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否则将继续进兵喀尔喀。

三十四年四月，噶尔丹储备充足后，便又率兵三万向喀尔喀进攻，沿克鲁伦河而下，到达了巴颜乌兰一带，扬言在过冬后，将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大举进攻漠南。康熙召集了三品官以上的武臣，商讨征剿方案。武臣中不少人主张不宜出击，理由是距离太远，部队要经过大沙漠地带，携带火器及运送粮食等尤为困难，劝康熙帝不能轻举妄动。但将军费扬古主张出击，认为噶尔丹为人狡诈，若不及早根除，对北部边疆将后患无穷。费扬古的意见正合康熙的意图，康熙又多次听取大学士的意见，组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于三十五年正月，作了出兵的决定，并再次率兵亲征。

二月，康熙下令发兵十万，分三路前进。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东三省兵，越兴安岭出克鲁伦河进击；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陕西、甘肃兵，由宁夏北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断噶尔丹的归路；中路为主力军，由康熙亲率，由北京出独石口，直奔克鲁伦河，与东西两路军协同夹击。

康熙的中路军，要在无边无际的沙漠、草原上行程数千里。他命令征调了大批扎萨克图部人作向导，每两名士兵配一个民夫、一头毛驴，随军运输粮食、器材及御寒器具。还组织了六千辆大车的运输队，携带了大量木材、树枝，以备在过沙漠和沼泽地时填路。

康熙在沙漠行军途中，时常关心着士兵和马匹的休息。当遇到行李运输迟缓，士兵们不能及时安营时，他每天不到五更就起身，亲自督促运输兵丁行李的驮队早一点出发，使行李先到营地。见到天气变化要下雨时，即传令将马匹盖好。三月的一天，队伍驻扎在滚诺的地方，正遇风雨交加，康熙见士兵们未能及时安营，就站在雨中，一直等士兵们结营完毕，才进行宫；等士兵们都开完饭了，自己才进餐。康熙在横渡沙漠的征途中，还写下了《瀚海》一诗：“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反映了他不辞劳苦的无畏气概和战斗精神。

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经过五十九天的艰苦历程，于五月初五由科图（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继续前进，逐渐逼近噶尔丹军。而西路军由于沿途草地大多被噶尔丹军焚毁，不得不迂回前进。因此，行军速度赶不上中路军；东路军也未能按期到达预定地点，这就形成了中路军突进的不利态势，这时又传说沙俄已出兵来援噶尔丹了。随征大学士伊桑阿担心孤军深入遭敌夹击，建议康熙将中路军后撤，并谎报噶尔丹已撤退西逃。康熙心里很清楚，他严厉训斥了官员中的畏战惧敌言论，表示这次一定要歼灭噶尔丹后才撤还。并警告官兵：“凡不奋勇前进者，必予诛之。”

康熙决意要中路军继续前进，并预计噶尔丹会依托克鲁伦河进行顽抗，就将队伍分成二路，准备夹击。克鲁伦河，横亘瀚海东北两千里，原来漠南、漠北蒙古之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在部队即将逼近时，亲自登高执圆镜眺望，察看地形。然后将一部分兵力占据左边的山麓高处，佯作大部队要从那里通过的样子，自己即率兵争先据河。

噶尔丹原先不相信康熙会亲征。他曾说过：“康熙皇帝不在北京城里安居乐逸，过这样的无水瀚海之地，难道能飞渡吗？”可他从清军放回的人员中得知，康熙已确实亲自出征。他自己到一座高山上一望，见“御营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失色地说：“官军是从天上而降矣。”遂传令，将庐帐、器械全部抛弃，乘夜而逃。等到康熙率兵渡过克鲁伦河，进抵巴颜乌兰，却扑了个空。

康熙见噶尔丹已逃遁，立即率领岳升龙等三名总兵，选了精兵轻骑，以“疾驰莫惮追奔力，须使穷禽入网罗”的决心猛追。同时密令西路军统帅费扬古，疾行于昭莫多（位今蒙古乌兰巴托南）设伏堵截。康熙连续追击了五天，终因粮食供应不上，只得停止。

费扬古接到康熙的密令后，督兵星夜驰奔。将士们知道皇上已到了克鲁伦河，无不奋发：“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们怎能不冒死前进？”到五月十三日，西路军终于先敌赶到昭莫多。

昭莫多，蒙古语为大树林的意思，因地势险要，自古即为漠北战场。康熙善于学习，重视研究历史，所以他果断地命令费扬古在这里设伏。费扬古按照康熙的部署，令部分骑兵下马步战，在昭莫多东侧依山列阵；依托土拉河布置了防御，将骑兵主力隐蔽在对面山上的密林中。费扬古刚布阵完毕，噶尔丹军已进至距昭莫多三十里处，他就先派骑兵四百迎战，且

战且退。噶尔丹率万余骑兵急追，到昭莫多后，猛扑清军各制高点。清军以弓箭、子母炮还击，激战整日，难分胜负。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军后阵不动，知道必是家眷、牲畜和辎重，遂另遣一支精骑袭击。于是，噶尔丹军营大乱。清军乘势四面出击，连夜追击三十多里，斩杀三千余人，俘获人畜无数，噶尔丹骁勇善战的爱妻阿奴也被斩杀，噶尔丹自己先率数骑逃跑脱身。

康熙于五月十八日得捷报后大喜，决定班师，留费扬古驻守喀尔喀，负责招降噶尔丹及其残部。

噶尔丹于昭莫多惨败后，又去西部纠集旧部，图谋投靠达赖喇嘛，卷土重来。不久，即网罗五千余人，打算到哈密过冬。康熙据此情况，仍把噶尔丹当作边疆地区的一大隐患，将注意力转向了西北地区，并作了两步打算，第一步先亲自招抚，如招抚不成，即进行第三次亲征。

三十五年四月，康熙率领两千八旗兵，以行围打猎为名，进行西巡。到了怀来城（今属河北）后，即派人将招抚噶尔丹的敕书，送给了大将军费扬古，要他广为颁示；不要急于出兵，要频繁地派遣准噶尔的降人回去做招抚工作。康熙还指示将陆续来降的准噶尔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其中头人都分别授以官职；还规定，凡来降的人不愿到内地的，都各配马一匹返回原地。叫他们向噶尔丹部下宣传朝廷的招抚政策，劝其归降。康熙的招抚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久，便有一千五百多人前来投降，使噶尔丹更加孤立。

十一月，康熙接到费扬古的报告，噶尔丹派了二十七人组成的使团前来议降，便接见了使团首领格垒古英，命令他立即返回转告噶尔丹，要其亲自来降，否则必发兵进讨。康熙这次西巡三个多月，招抚了噶尔丹的众多部众，扼制了噶尔丹的外援，重新部署了西北的兵力后，于十二月回京。

二月六日，康熙命令发兵六千进击噶尔丹。兵员从西北驻守官兵中抽调，不必另从京师发往。兵分两路：一路由内大臣孙思克等率领，出嘉峪关；一路由大将军费扬古等率领，出宁夏。两路军分进合击。康熙亲临宁夏节制作战。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到达宁夏，将诸事安排就绪后，继续向前线深入。到达黄河西岸的船站，亲自视察八旗前锋、黑龙江兵及绿旗兵。然后又到狼居胥山，亲自组织运输军粮过一百二十里的无水地区。接

受以往教训，调了部分粮食及马匹储藏在附近各个驿站，待部队回师时补给。康熙一切部署就绪，只待佳音。

四月十五日，康熙接到报告，噶尔丹已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塔台的地方服毒自杀，有的说是得暴病死的。噶尔丹部下首领丹济拉等，携带噶尔丹尸骸，及其女钟齐海，共三百户来归降。五月十六日，康熙凯旋。后在《剿灭噶尔丹告祭天坛文》中，对三次亲征作了概括：“亲统六师，三临绝塞，弘彰挞伐，克奏肤功。”持续了近十年的噶尔丹战乱，至此结束，从此漠北和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被扫除。

第八章 尊崇宋理学

一

康熙皇帝亲掌政权以后，为了加强自己对思想领域的统治，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将程朱理学确定为正统哲学思想。这一行动，不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此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程朱理学又称道学，北宋时由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等人创立，南宋时朱熹集其大成。程朱理学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主“即物而穷理”。由于程朱理学更合统治者的需要，因而从南宋后期始即被尊为官方哲学，历经元、明，相沿不改。清朝入关初，统治阶级忙于统一全国，只笼统地崇儒重道，还无暇裁定朱王之争。康熙即位后，随着崇儒重道国策的推行，康熙皇帝越发认识到程朱理学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程、朱。

康熙皇帝尊奉程朱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儒臣熊赐履的影响。熊赐履笃信朱学，“读孔孟之书，学程朱之道”，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康熙十四年三月一直充任日讲官。他以朱熹注《论语·学而》篇的讲解，开始了康熙一朝的日讲。此后，熊赐履始而隔日进讲，继而每日入宫，向康熙皇帝讲“读书切要之法”，讲“天理人欲之分”，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讲“辟异端、崇正学”，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熊赐履等人的影响下，康熙皇帝逐渐接受了程朱理学，并开始把它奉为官方哲学。康熙皇帝尊奉程朱理学的措施，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程、朱看作孔、孟正传，大力宣扬程朱理学。康熙皇帝认

为，程朱以前，“虽汉之董子（仲舒）、唐之韩子（愈）亦得天人之理”，但却“未及孔孟之渊源”，没有得到儒家学说的精髓；到了北宋，邵雍“玩索河洛之理、性命之微，衍先天后天之数，定先甲后甲之考，虽书不尽传，理亦显然矣”；周敦颐“阐无极而太极，复著《通书》，其所授受，有自来矣，如星辰系乎天而各有其位，不能掩也，光风霁月之量，又不知其何似”；程颐、程颢“充养有道，经天纬地，聚百顺以事君亲”；朱熹“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才得到孔孟正传；因此，只有程朱理学才是治国的学术，“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

第二，刊刻程、朱之书。为了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皇帝不遗余力地刊刻程、朱之书。《性理大全》是明朝永乐年间纂修的收录程、朱等人的理学著作及有关性理的语录的一部官书，影响颇大。康熙皇帝“见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义，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纪纲，靡不大小兼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藪，致治之准绳”。乃命儒臣对其重加补订，并亲为作序，刊行全国。后来，为了宣扬朱熹之学，康熙皇帝令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录章摘句，收集朱熹的一句一字，编成《朱子全书》，并亲为之制序，刊行全国。康熙皇帝还令修《周易折中》，“上津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持论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又以《性理大全》等书繁杂矛盾，下令节编性理诸书，成《性理精义》，并亲自为之作序。在为《性理精义》作的序中，康熙皇帝叙述了自己对程朱理学的崇奉态度及该书的编纂经过：

“朕自冲龄以来，六十多年间，未尝一日放下过经书。唐虞三代而后，历代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到了宋代，学者们才提出性理这个名词，使人了解尽性之学即学习圣贤之道，不外乎遵循理的规定。朕敦好典籍，对于理、道等有关论述尤为留意，而且在位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越发认识到其确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书，可谓广备，但其搜取太繁，重复较多。各地流行的性理之书不下数百种，而相互矛盾者比比皆是，很不利于程朱之学的传播。于是，朕命大学士李光地将程朱之书加以诠释进览，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既使诸